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记

□ 姚 申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元旦社论,提出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定一部新宪法确认已经取得的经验与成果,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绝密南行

1953年12月24日下午3点多钟,一辆专列缓缓地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不久,陈长江等80多名警卫人员将很多书、文件、衣物、床上用品等搬上了列车。这些东西让车上的服务员很吃惊,特别是车厢高高堆起的书占据了第一节车厢的好些地盘。其他行李却很简单:一件打补丁的旧睡衣、两块灰色的旧毛毯、一把没有多少毛的牙刷……如此爱看书的、如此俭朴的中央首长究竟是谁呢,服务员充满了疑问。

20多天前,服务员们就被领导叫去谈话,说要执行一次既重要又光荣的任务,这是全国人民的重托,要保证完成好。细心的服务员们发现检查列车准备工作的竟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看来这位首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前往浙江杭州,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在一年前,全国政协常委通过了周恩来关于起草宪法的决议报告。毛泽东亲自挂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但由于其间部分省市受灾,国家忙于救灾,以及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数次病倒,宪法起草被推迟了。这次毛泽东离京就是要摆脱北京的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搞好宪法起草。

第二天早饭后,车上的服务员终于见到了这位神秘的首长,他就是毛泽东。此刻的毛泽东正斜靠在宽大的沙发上吸着烟,沉思着。

专列向南奔驰着。12月25日零时25分至德州西,宿营至6时30分;25日10时至济南,24时至蚌埠支线,在这里宿营至26日9时30分,随后去南京,26日24时至上海。

在专列上,毛泽东度过了自己的花甲大寿。

27日19时20分,专列离开上海;28日凌晨,抵达目的地杭州。毛泽东和随行人员下了车,在浙江省委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杭州北山路84号。

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楼是毛泽东一行人的办公地点。30号楼由主楼(两层小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毛泽东在大平房办公,大平房里有间会议室。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宪法起草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从1954年1月9日开始到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了。其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宪法研究小组也来到了杭州。起草小组还聘请了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修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6日完成“三读稿”。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田家英在其中承担了很多具体工作和直接修改工作,通常彻夜不眠,甚至累得吐血。

首部宪法诞生

毛泽东这次到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在杭州期间,除了起草宪法,他还专门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介绍了中共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个人在杭州的最大收获就是每天坚持爬山,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

田家英后来回忆,他们就在毛泽东爬山的时候修改宪法稿子。

宪法草案“三读稿”通过后,毛泽东的心情轻松了许多。3月2日这天,他登上了玉皇山顶,在这里伫立四望,右面是妩媚妖娆的西湖,左面是波澜壮阔的钱塘江,杭州城尽收眼底。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

1月23日,杭州下起了大雪。当地人说,这是杭州几十年未遇的一场大雪。24日,大雪初晴。毛泽东特别喜欢雪,高兴得不得了。一早他就起来,到西湖边看雪景。逢此难得之景,毛泽东身穿深色呢子大衣、头戴浅灰色呢帽,两手合插在身前,含笑站立在刘庄西湖边的石栏处,让摄影师侯波帮他拍照。

只有美丽的白雪才可以使毛泽东把手头工作放一放。他带领工作人员,每人拿一根小棍,小心翼翼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头,观望西湖雪景。随后,他又驱车到郊外,沿着钱塘江西行。翻过一座山梁,他的眼前闪现出一片银色的田野。毛泽东急令停下,大家戴上口罩,下了车。卫士们想扶毛泽东,他大手一挥,就往雪地里快走,也不管哪里是垄哪里是畦。快走了一阵,他站住了,抓了一把雪放在手心里揉搓。卫士们要向前

为他探路,却被他制止。原来,他是不想踩破雪被,惊醒沉睡的田野。他拉下了大口罩,静静地望着,深深地吸着被雪过滤了的清新空气。直到返回的路上,毛泽东仍沉浸在与雪亲近的喜悦中。

在杭州期间,正是中共中央刚刚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多次听取浙江省负责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在3月初的一次汇报中,他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阵”变成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十分兴奋,当即表示要去看看。

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察看,一面向农场负责人询问情况。随后,游览了东湖风景区。面对陡峭的悬崖,潺潺的流水,以及散布在山水之间的飞檐亭榭、拱形石桥,毛泽东感慨万千,指着陡立的石壁对身边人说:“这不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而造成的。”

看到前面有家小茶馆,毛泽东走了进去。在八仙桌旁,毛泽东谈起了绍兴的历史和名人:“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

杭州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此,这里成了他经常驻足的地方,据说曾先后到过这里40余次。

3月初,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专门就宪法草案在文字上的特点作了说明:“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拿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经过历时80多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宪法草案提交全国公开讨论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年,中央从人民大学及其他单位抽调一部分法律专业人士临时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有幸入选。接受笔者专

访时,已是著名宪法学家的许崇德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个小青年,才20多岁,我是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员参加这项工作的,那时是田家英同志在高校点兵找去帮忙的。”从小身经战乱、吃尽穷灾民苦头的许崇德,深知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大法的重要性。虽然只是从事辅助性工作,但仍十分专注认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材料,并提供相关资料,还整理了征求意见、全民讨论送来的讨论材料和意见,经历了宪法起草的全过程。

当年全国政协、各地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武装部队等组织了各方面人士8000多人参加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5900多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此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他们热烈拥护,又提出110多万条修改或补充意见。讨论中提出的意见,都由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上报中央。许崇德回忆说:“1954年是特大洪灾。所以交通中断了,大水都冲掉了公路、铁路,当时的讨论意见是用飞机运送到北京来的,那真是感动人。”

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人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立即送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经过全国性大讨论,宪法草案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会上被庄严全票通过,因其在1954年颁布,史称“五四宪法”。

(摘自2017年第8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毛泽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



于敏回忆『中子物理研究小组』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认为,氢弹比原子弹在科学技术上要复杂得多,突破原子弹以后,氢弹要快上,就要早做准备,早做预先研究。但是,当时研制核武器的大本营二机部研究院,正在全力以赴地突破原子弹。为了不分散研究院的精力,他们就把氢弹的预先研究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1960年12月,钱三强首先组织黄祖洽等带领一批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小组,为了保密,代名叫“中子物理研究小组”,开展氢弹的基础研究。一个月以后,我也正式参加了这个小组。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齐心协力,思想很活跃,奋发图强,埋头苦干,非常富有奉献精神。

开展核武器研究,要研究热核燃烧的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那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的I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主要的机时要保证主战场,给研究院使用。我们每个星期只分到十几个小时。但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小机器,每周的这十几个小时,通过全组科研人员4年左右时间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对有关的物理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论证后,进行了重点计算,并对计算结果的每个数据做了由表面现象到物理实质的系统的、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分析,解决了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当时,提倡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我们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

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得到了许多有关热核燃烧的内因和外因的重要现象和规律。同时,我们还对氢弹的原理作了一些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实践证明,这个小组当时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后来突破氢弹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个小组、对那段时间的非常有意义而又颇有成果的工作还充满感情,非常怀念。

(摘自2019年第10期《百年潮》,黄艳摘编自《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科学时报社/编)

(上接1版)既要克服脱实向虚的现象,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建立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金。如以创业(风投)基金支持创新创业,以产业基金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以并购基金支持企业重组。

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土地市场一般与房产市场密不可分。土地市场建设的重点在规范。土地一级市场要引入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土地二级市场上不仅要充分竞争,也需要建立防止过度投机的监管机制。现阶段补土地市场的短板突出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入市和流转。一方面解决集体土地进入非农用途市场与国有土地出让市场的同地同权问题。另一方面探索在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农民承包地承包权、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建设问题。

发展技术市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需要发展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和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新技术的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是技术要素的最大浪费。发展技术交易市场的着力点,一是技术市场建设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克服新技术供求信息的不对称。二是活跃科技中介,这是技术市场重要组

成部分。三是强化技术市场上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营。

充分开放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可以实现人尽其才。就业优先战略的实施更需要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突出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不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还要促进城市劳动力进入农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第二,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才是第一要素。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不能停留在简单劳动力市场建设,需要建设和完善人才市场,其中包括科技人才市场和企业家市场,在这类市场上人力资本价值重要的评价标准。

大数据的市场分享。在信息社会,尤其是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后,大数据成为除资本、技术、劳动、管理、土地以外的新的发展要素,甚至要比石油资源还要重要。大数据是在互联网上对海量数据经过分析和处理的数据。现在从微观到宏观,从产业到技术,从企业到市场,大数据在其中起的生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数据才刚刚被认定为生产要素,其市场建设也才起步。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需要尽快建设和完善大数据市场,以市场方式来实现大数据的有偿共享和互联互通。以数

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打通数据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

破除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推动公平且充分的市场竞争

公平且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市场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所谓充分竞争,表现在:一是要素自由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地点,其条件就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二是优胜劣汰的竞争能够出清市场,无论是剩余的供给还是剩余的需求。所谓公平竞争,表现在:市场准入公平,市场交易公平,机会均等。这种市场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市场的选择功能,也就是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二是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虽然经过市场化改革,我国在各个市场上竞争局面已经形成,但还需要更为深入地促进公平且充分的竞争。

就充分竞争的要求来说,需要进一步扩大物质性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

形成的范围。现在竞争性领域价格基本已经放开,由市场定价。但是,涉及水、电、气、电信这样一些自然垄断性领域中的物质性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放开,由政府规制。针对政府规制和行政的垄断造成的低效率问题,规制改革的主要走向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转向激励性规制。更多地把一部分被政府规制的要素放给市场去配置。在电力行业之类的自然垄断行业可能分离出的竞争性部门,退出政府规制的范围。政府定价范围就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同时赋予被规制企业以更多的确定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自由度,使被规制企业更加趋于按商业原则经营。

就公平竞争的要求来说,需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要素在统一开放的市场配置才有效。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统一市场并没有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已有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地区发展政策又强化了地方利益,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壁垒,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统一市场建设突出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地方保护,二是打破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三是打破城乡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城乡市场。

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强化竞争政

策基础地位。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竞争政策则是政府为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济政策。竞争本身属于微观经济,竞争政策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这需要国家实施支持和保护竞争的政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起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结合。

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基础。基于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国家制定的竞争政策要起到基础作用,就是要为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提供政策环境。包括政府退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对资源配置起调节作用的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等。

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培育市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和政策上解决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的市场地位,各种所有制经济公

平竞争,这就是所谓的竞争中立。二是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不是靠政府保护而是靠竞争来维持的。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就是要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促使其唯一地依靠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来保持和巩固主体地位。

产业政策以竞争为基础。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在产业组织中起基础性作用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产业政策的实施主要依靠竞争机制;竞争性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竞争性选择鼓励发展的产业,竞争性淘汰落后产业,竞争性建立上下游产业联系。二是在更大范围减少垄断。竞争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竞争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本身也有费用,严重的无序竞争、过度竞争、恶性竞争,造成了过高的竞争费用。分散化市场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广告费用和竞争费用。降低市场调节成本的重要路径是建设有组织的市场,促进企业集中。无论对哪种市场,都要反垄断行为。相应的需要完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化竞争政策需要一系列的制度配套,如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等。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